

论拉吉舍夫的哲思

——移动性理论视域下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研究

穆嘉伟

(黑龙江大学, 哈尔滨 150080)

提 要: 拉吉舍夫是俄罗斯 19 世纪的文学家和贵族革命家, 也是一位思想家。他怀着对人类尊严和社会正义的热情, 穷尽一生追求真理, 用坚定的笔触唤醒人民。他的作品反映了他对人、社会和世界的观照。评论界一般将他的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主要界定为一部反对专制农奴制的著作, 其中反映了作家的革命思想。但此外, 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也阐明了自己对于法律、人权、婚姻、家庭、教育和生命等一系列事物的看法。《旅行记》文本是通过移动构建的, 运用移动性理论分析这部作品能够帮助我们剖析拉吉舍夫深刻复杂的思想、挖掘《旅行记》的丰富内涵。

关键词: 拉吉舍夫;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移动性

中图分类号: I512.06

文献标识码: A

1 引言

1790 年, 拉吉舍夫 (Александр Николаевич Радищев) 出版了他的主要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Путешествие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就其内容来看, 这是一部极具现实意义的作品, 作品的思想性甚至大于它的文学性。在记录旅途见闻时, 作家没有着重刻画人物形象、制造故事悬念, 只是朴素地叙述人物悲惨经历后, 便开始进行说教。就作品体裁来看, 作家使用了当时较为流行的旅行记, 这对于他来说是一次模仿和探索。

2 拉吉舍夫和他的《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

青年时, 拉吉舍夫被派往德国莱比锡大学留学, 期间他接触了先进的思想; 学成回国后, 他在公职部门任职, 亲历了社会的不公, 亲眼目睹了农奴被欺压、毫无人权的现实。启蒙思想和俄国社会的对比给他带来了强烈的冲击, 叶卡捷琳娜二世开明君主制的骗局激起了他的怒火, 就这样, 感伤主义作品《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以下简称《旅行记》) 应运而生。

感伤主义起源于 18 世纪中期的英国, 这一派作家站在了古典主义的对立面, 把目光从英雄、大人物转向普通人; 他们重视感情, 描绘人物的悲惨遭遇。旅行记是感伤主义文学的流行体裁。

单从故事性方面看, 可以说《旅行记》是“拙劣”的模仿。普希金曾评论道, 拉吉舍夫永远在“摹仿别人”, 他的诗歌写的比散文好, 是因为罗蒙诺索夫、杰尔查文等人“早已推敲出了俄语诗体语言”, 而在散文中没有可供他摹仿的范本。普希金认为《旅行记》的文笔粗劣, 夸张粗俗, 情绪矫揉造作, 显得十分可笑 (普希金 2012: 371)。尽管普希金对作家

的批评过重，但“平庸、粗俗”等却并非空穴来风。诚然，同斯特恩（Laurence Sterne）《多情客游记》（*Sentimental journey through france and italy*, 1768）相比，《旅行记》的语言无聊沉闷，篇幅冗长乏味。作品的模仿性还体现在它几乎照搬了旅行记的“标准模式”，即开篇对朋友的敬意、同马车夫的交谈、旅途中的同伴、农民的婚礼……如果只谈论文学性，那么可以认为《旅行记》是一部并不出彩的作品，但拉吉舍夫在《旅行记》中前所未有的思想高度，却使俄国文学在这方面超越了其他欧洲国家的文学（曹靖华 1992：55）。

实际上，拉吉舍夫采用旅行记体裁亦是为满足作品思想性的需要。旅行记能表现多种主题、事件，同时帮助读者开阔眼界、克服无知，所以作品承载了引起人民义愤并使他们发挥社会价值的期盼。

那么拉吉舍夫通过何种方式来表达思想呢？正是通过《旅行记》中多种形式的移动。齐美尔（Georg Simmel）很早就对移动性进行过讨论，在《桥与门》中他指出，人具有追求“联结”和“逾越分离”的本能，于是就有了桥。我们可以说，无论是精神上还是实践上，拉吉舍夫都努力地扮演着西欧和俄国之间的“桥”。在作家的时代，俄国同西欧存在巨大差距。青年时的拉吉舍夫就受到了多位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他重视人权，追求社会公平正义；学成回国后，作家注意到了俄国与西欧社会间存在巨大割裂，他力图改变俄国现状，唤醒人民，使俄国向西欧靠拢，于是写下了这部作品。创作《旅行记》是拉吉舍夫受联结意愿的本能驱动，因此《旅行记》文本是通过移动构建的。从移动性理论出发可以发掘《旅行记》的丰富内涵和拉吉舍夫的深刻思想。

3 新的移动性范式和文学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移动性理论备受关注，它具有跨学科的特性和反本质主义倾向，所产生的主要学术成果包括德勒兹（Gilles Deleuze）的游牧学（nomadology）、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流动空间”（spaces of flows）和厄里（John Urry）的旅游研究等（张杰 2021：119）。2006 年，厄里和谢勒尔（Mimi Sheller）等人正式提出，社会科学内部已经形成了一种“新的移动性范式”（the “new mobilities” paradigm），应当加快推动社会科学的“移动性转向”（mobility turn）。相比于生活中移动性的普遍化，传统社会科学的研究却仍然保持着安栖主义¹的思维方式，依然将稳定性、意义和地方置于距离、变化和无地方性之上（张杰 2021：119）。2006 年 5 月克雷斯维尔（Tim Cresswell）出版了专著《移动中——近代西方世界中的移动性》（*On the Move: Mobility in the Modern Western World*）。该书梳理了西方近代以来移动性理论的产生和发展，指出了人们对于移动性评价的变化。作者把移动性这一地理学概念与社会学联系，研究移动性的意义，同时关注移动的起点、终点、移动和影响过程等因素，揭示过程承载的意义和权力关系，即移动性政治。2007 年底，厄里在《移动性》（*Mobilities*）中将移动分为五类：人的身体旅行，物品的移动，人利用睡梦、印刷等媒介产生的想象旅行，超越地理与社会距离的虚拟旅行和利用通讯的社交旅行。新的移动性范式跳出了安栖主义的思维惯性，用运动视角审视与剖析文化现象；它不仅关注移动的起点和终点，还研究移动的过程，着力发掘过程承载的意义。

那么将移动性理论用于文学研究是否可行呢？国内外学者已经做出了尝试。如武越在《移动性理论视域下的美国华裔文学研究》一文中关注到与自由进步的美国移动性神话不同的亚裔移动性，他从移民经验、身份认同等角度入手，分析美国华裔文学作品中体现的移动性。除移民文本外，我们认为文学作品中的旅行文本也是值得研究的对象。利弗西（Ruth Livesey）在《书写马车国家：19 世纪英国文学中的地域变迁》（*Writing the Stage Coach Nation: Locality on the Move in Nineteenth-Century British Literature*, 2016）一书中对司各特（Walter Scot）作品中邮车路线、马车旅行、旅行中断、步行、流放等场景和情节从移动性角度作出了诠释和分析。

在此基础上,我们认为以移动性理论分析拉吉舍夫的《旅行记》能够深挖作品蕴藏的丰富内涵,解读拉吉舍夫复杂的思想,还原作家的立体形象。同时,本文实践性地将移动性理论应用于文学研究,这一跨学科的尝试应当是有益的。

4 拉吉舍夫的旅途

启程前,拉吉舍夫给好友库图佐夫写了一封信,信中作家坦露了书写《旅行记》的原因——人民遭受着苦难,这使他产生怜悯、陷入苦闷。作家的目标是揭示真理,帮助人民找到出路、摆脱苦难。叶卡捷琳娜二世统治时期,俄国专制达到顶峰,舆论控制极其严格,农民起义被无情镇压,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作家的“造反”不仅需要极大的勇气,而且要凭着一腔热血和极高的社会责任感,拉吉舍夫正是这样一个爱国赤子。了解到作家背负的使命,就不难看出《旅行记》自始至终存在着一种紧迫感,进而作品中略显生涩的语句打磨和稍显乏味的故事叙述也就变得可以理解了。

应该注意,这次旅行是拉吉舍夫主动寻求边缘化的过程。在古早时期,移动就是行走在社会的边缘:人们喜爱定居,难民和流浪者被排斥,例如流浪民族吉普赛人就常被与巫术、瘟疫联系在一起。《旅行记》的出发点和目的地是俄罗斯的两个首都,它们是俄罗斯的中心和上流权贵的聚集地,但对于这两个大都市作家却几乎只字未提,他的目光始终投向沿途的村镇。如果说贵族和大地主是社会的中心,那么处在社会边缘的就是广大农奴群体。拉吉舍夫说,人的拯救者就是他自己,作家不仅体恤农奴,同情他们的悲惨遭遇,而且还提出了他们应该具备拯救自己的能力。在《叶德罗沃》一章中记录了拉吉舍夫对美的认识,他望向河边劳动的农妇,欣赏着他们健康的气色和纯洁坦率的美丽,暗自贬斥涂脂抹粉的贵族小姐。劳动是美好、伟大的,农民是阳光、朴素的,拉吉舍夫对于农民和劳动美的认识是开创性的,这使后世许多作家逐渐将目光投向乡村和农民。

《启程》一章中,拉吉舍夫悲伤地同亲友告别,这种痛苦不是毫无来由的,谁不渴望稳定的生活和家人的陪伴?移动意味着不确定性,它造成的混乱感会使人产生恐惧。移动性的第一层含义是地理意义上从一个地方移动到另一个地方去,移动的愿望与对移动的抗拒反映了作家拥抱变革与渴望稳定之间的矛盾拉力,此处移动具有进步的隐喻意味。拉吉舍夫期望《旅行记》的发表能获得他人在自己“前进路上”(拉吉舍夫 1982: 3)的支持,在肉体和精神遭受双重禁锢的社会中,移动已不再是令人谈之色变的洪水猛兽,而是成为捣毁旧秩序的突破口。

4.1 马车旅行

马车旅行是串联《旅行记》的主要线索,移动中的马车值得我们关注。克雷斯维尔认为,移动性包含六个层面,即起点、速度、节奏、路线、经验和摩擦。作品中拉吉舍夫对于道路的刻画引起了我们的关注。《启程》一章中,马车平稳行驶时,主人公拉吉舍夫进入梦乡,突然马车掉进辙窝,将他惊醒,辙窝提示了道路的不平整。《托思纳》一章中,拉吉舍夫猜想道路一定很好,因为沙皇出巡后,过路人都说它不错;但良好的路况只维持了一段时间,之后大道就无人看管,变得泥泞不堪了。通过对道路的描写,拉吉舍夫讽刺了沙皇的特权,他指出了众人习以为常的事实,反而能够引发思考:难道这是合理的吗,难道我们理应默默接受吗,人们只会抱怨泥巴弄脏了鞋,不会注意到这和沙皇有何关系。拉吉舍夫注意了常人难以发觉的细节,自由平等的观念已经刻入他的基因,所以他才显得如此格格不入,这也为他后来无人支持、被放逐异乡的结局埋下了伏笔。

其次,旅途中的摩擦也很值得关注。主人公拉吉舍夫乘驿车出行并不能自由选择出行路线和时间,其间驿站是重要的节点,它为旅客提供休息和换马的场所,也因而使旅客们产生交集。《索菲亚》一章中,拉吉舍夫手持驿马使用证,几次推了熟睡的驿站长,却因人微言轻,被驿站长斥责和拒绝服务。《扎维多沃》章中,拉吉舍夫换完马正准备启程,却突然被

一名近卫军将马匹征用。作家的争论在将军特权前显得苍白无力，作家花费一小时套的马只不过一刻钟便被套给了将军。通过刻画这两个驿站，作家披露了俄国严苛的等级制度。即使作家身为贵族，但面对更高等级的人也没有任何特权。权贵不会允许反抗他们的人存在，作家清楚地知道捣毁旧秩序并非易事，但他明知不可为而为之，这刚直的性格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不禁令人钦佩。

作品中人物移动的方向同样值得我们关注。《启程》章中，拉吉舍夫就指出了本次旅途是“前进的道路”，而他移动方向是从彼得堡到莫斯科，一路上作家遇到了许多旅伴，他们移动的方向不同，构成了不同的意象。第一位与作家逆向而行的旅行者出现在《托斯纳》章中，这是一名从前的小官吏，他搜集了一些破损的贵族谱系文件，期望把它们卖给没落贵族以换取封赏。拉吉舍夫塑造了这个逆行的追名逐利者，为我们指出“夸耀古老门第”（拉吉舍夫 1982：9）的腐败性，直接批判了贵族继承制度——贵族好吃懒做却可以继承家产，平民勤学苦读却难有出头之日。而作为对比，《波德别列齐耶》一章中，作家塑造了另一个去往彼得堡寻求科学知识的平民青年。大都市既是腐败的名利场，又是知识圣地，这本身是不矛盾的，从作家对两人的不同态度可以看出他的取舍，拉吉舍夫赞赏青年，并提出了关于教育的看法，例如应舍弃繁复的拉丁文，用俄语编写教材；应破除迷信，切实研究自然现象，探求真理等，这无疑是进步的和顺应历史潮流的。

《丘多沃》章中作家遇到了和自己同向而行的友人。友人曾在彼得堡附近的海上遭遇巨浪，几近遇难，同伴去城里求助，但长官却呼呼大睡；醒来后的长官面对惊险脱困的友人也没有丝毫愧疚，身边的人听说后也不置一词，于是友人失望而愤怒地离开了这个“虎狼盘踞”的城市。引发拉吉舍夫和友人同向移动的是二人对腐败社会的厌恶，但友人移动得比作家更远，他向着“没有人迹，甚至连人的名字也没有听过的地方”（拉吉舍夫 1982：24）前进。借助友人，作家提出了避世的方案，在对社会失望透顶时，这也不失为是一种选择，但这却不是作家想要的，拉吉舍夫追求的是大众的福祉，他认为友人是急躁而自私的。面对令人痛心疾首的社会现状，作家不是独善其身，而是谋求社会的变革和大众的幸福。

4.2 想象旅行

睡梦夹杂于拉吉舍夫的旅途始终。在关注了移动中的马车后，我们应发现马车内部亦构成了独立的文学空间，作家在其中进行着另一形式的旅行。厄里在《移动性》中提到，除身体旅行外，借助睡梦、信件等媒介进行的想象旅行也是移动的方式之一。

《旅行记》中，睡梦作为重要的意象多次出现。从文学性方面讲，睡梦是带有神秘和启示色彩的象征符号，给文章蒙上了一层寓言色彩；而从理解作家思想的角度看，睡梦着重刻画了作家的心理活动，使我们能获知作家的软弱与痛苦、执着与坚定，接触到作家对于世界更深层的理解。梦境不仅让《旅行记》的故事更完善、层次更丰富，而且使得拉吉舍夫的形象更完整、更丰满了。

作家的睡梦具有“目的性”，因此他多次营造睡眠的场景，试图将读者也拉进梦境中来。例如作家除了描绘自己的睡梦，还热衷于塑造睡眠中的他人形象。《索菲亚》章中，他描绘了呼呼大睡、用被子蒙着头不愿被吵醒的驿站长；《丘多瓦》章中，他刻画了熟睡的长官，哪怕一船人将要被淹死也不能将他唤醒。《黑泥村》章中，作家干脆使用了诱导式的话语，“如果你阅读时想睡觉，那就合上书去睡好了。”但是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睡眠后，作家没有感觉精神焕发，反而越发昏沉，头像宿醉一样难受，我们认为作家试图将睡梦同死亡联系起来。《丘多瓦》章中，长官的睡眠会引发一船人的死亡；《索菲亚》章中作家更是直接同神明展开关于死亡的对话：他在睡梦中喃喃道，死就是苦难的终结吗？他质问神为何不理睬结束自己生命、将自己奉献给神的人，以此抒发了自己关于生命和灵魂的哲思，他认为神并不是无选择地接纳所有灵魂。《勃隆尼齐》章中，作家说道：“大慈大悲的天父啊，你在寻找真诚

的心和纯洁的灵魂。”（拉吉舍夫 1982：63）他认为只有真诚和纯洁的人死后才能升天，灵魂的不朽取决于正义和真理。值得一提的是，拉吉舍夫关于睡眠和死亡的书写与茹科夫斯基（В. А. Жуковский）有所不同，后者创作的《柳德米拉》（Людмила, 1808）中，少女噙着泪入睡，突然看到未婚夫出现在窗外、呼唤自己，她迫不及待扑入他的怀抱，任由未婚夫纵马疾驰，直到来到一片墓园——原来未婚夫早已死去，少女被他一同带进坟墓。与此相比，拉吉舍夫的书写缺少了一份神话色彩，但启示意味却依旧深刻：危机就潜藏在日常中，若不加警惕就会导致温水煮青蛙的结局，如此梦的寓言意味就不言而喻了。

拉吉舍夫的梦想通过三个层次与现实相勾连。

首先，旅行者拉吉舍夫在梦境中逃避现实。农奴的苦难和社会的不公使他饱受折磨，试图在潜意识里通过睡梦逃离现实的痛苦。就像他在《索菲亚》章中说的：人一生下来，造化就用苦难的襁褓包裹他，使他一生颠沛流离，而睡眠是他的快乐，倒头一睡，万事皆休。作家刚从彼得堡出发，就“迫不及待”地进入了睡梦：在马车里躺下，驿车的铃声带他进入了梦乡，在那里他发现身处空旷的山谷中，山谷草木枯槁，环境恶劣，感到被抛弃的作家无助地大喊。睡梦中的人无依无靠，面对俄国这只庞大的“怪兽”，任何人都会被压得喘不过气，梦境传递了作家对残酷现实的恐惧。但突然马车掉进路上的辙窝，将作家惊醒，梦境就这样略显讽刺地戛然而止。梦境中的空旷山谷是崇高的象征，而简陋的道路将作家拉回现实（Э. И. Коптева 2010：28），借旅途的第一个梦，作家暗示了他的理想是美好的，而任务是艰巨的，也注定是孤独无助的。

其次，拉吉舍夫也会在梦中批判现实。浅显地说，鉴于严格的书报审查制度，这无疑起到缓和语气和减少冲突的作用；而更深地说，梦境特有的迷离感和启示意味使它自身与现实隐约产生联系，这使读者产生具身旅行感，从而能更清晰地认知事情的本质，理解作家的呼吁。《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章中，拉吉舍夫得知了法官将法律用作攫取私利的工具，于是陷入愤怒并逐渐产生倦意，进入睡梦。梦中拉吉舍夫是权势滔天的皇帝，一个呵欠就使人战栗，所有人都为他歌功颂德，而他则大施仁政；但当他醉于自身的贤明时却出现了一个云游女人，她指出皇帝不应狂傲，应认识到责任的重大；这时皇帝看清了，奖章总是在德不配位的人手中，腐败和黑暗充斥着每个角落，他的伟大原来是自我欺骗。就这样，拉吉舍夫在梦中对沙皇进行了一番辛辣的嘲讽，同时云游女人形象的引入让这一章节蒙上了一层神话色彩。《勃隆尼齐》章中，拉吉舍夫去探访一座古神庙，幻想和神沟通，在这次“朝圣”中，作家假借上帝对读者进行了一番关于智慧的说教。从拉吉舍夫对待神明的态度看，我们很难说他不信神的，但他同时也推崇自然科学，具有唯物论倾向。《波德别列齐耶》章中拉吉舍夫借信件说道，人们在认识自然界时，也许会发现灵魂的东西与物质的东西之间存在隐秘联系，精神世界的一切变化、波折，可能是由于地球以及和它一样环绕太阳旋转的太阳系其他星体都是圆形，作家暗示了物质和意识之间的联系，且隐隐认为意识的运动是由物质决定的。

拉吉舍夫在睡梦中为社会指明方向，这是睡梦与现实勾连的第三个层次。

《斯巴斯卡亚·波列斯季》一章中，拉吉舍夫借助梦境同沙皇进行了直接的对话，并对之进行劝诫。他说道，如果沙皇的手指上总有一个荆环该多好，世上的统治者，如果你读到这段记梦时皱眉或一笑了之，那么你要知道，云游女人已经离开了你，她鄙弃你的宫殿。荆环的意象暗指基督的荆棘王冠，拉吉舍夫提醒沙皇敬畏上帝，谨慎地行使职责。这次梦的开端中，拉吉舍夫梦到自己是“沙皇、沙赫、汗、王、别伊、土酋、苏丹或类似这些称号的人物”（拉吉舍夫 1982：34），讽刺了沙皇并不是独一无二的，类似地位的人还有许多，暗暗地将沙皇降了一个等级，这其实暗合了作家推崇的社会契约论。拉吉舍夫在翻译马布里（Cabriel Bonnot De Mably）的言论时批注道，“专制主义是一种与人类本性最相抵触的状态。

法律是一般意志的产物……如果把我们的权利和自然权力的一部分分配给法律，那就是让它为我们所用；在这一点上，我们与社会签订了一份契约。如果它被破坏了，我们就可以从义务中解脱出来（A. McConnell 1964: 50）。”社会契约理论赋予人民暴力推翻暴政政府的合法性，这也正是拉吉舍夫革命思想的来源之一。至于拉吉舍夫是否主张通过农民革命推翻沙皇，我们可以认为他是持保留意见的，因为他提出了以改革代替革命的方案。

《叶德罗沃》章中，拉吉舍夫假借信件勾画了俄国未来的蓝图，他建议废除宫廷官职、改革法案，提倡自由、博爱、平权，反对暴力、压迫和战争，他提出重视农民、废除农奴制。在叶卡捷琳娜二世逝世后，两任沙皇分别解除拉吉舍夫的流放并邀请他回政府工作，作家听后格外振奋、想一展宏图，由此可以看出拉吉舍夫对沙皇仍抱有一定程度的幻想，他不是一名彻底的革命者，而更像是一名改良派。社会契约论中，统治者与人民订立契约，人民支持沙皇统治的同时，统治者要保证人民的权利。在作家看来，沙皇才是合法的权力拥有者，但沙皇有义务确保人民的福祉，暴政的沙皇违背了社会契约，背叛了人民，所以才理应被人民推翻（Д. Р. Садикова 2015: 219），尽管拉吉舍夫显然更倾向于共和制，但他反对的是不公正的沙皇，并不是君主专制制度本身。因此作家在作品中提及了革命和改革两种方案，结合他敬神的同时兼有唯物倾向这个事实，我们认为作家的思想是复杂和犹豫的。

4.3 散步旅行

厄里在《移动性》一书中提到，步行是人最重要的移动形式，同时也是其他移动形式的组成部分。如果说马车是贵族的特权代步工具，那么步行就是人人都具备的移动能力，《旅行记》中也穿插着拉吉舍夫的徒步旅行书写。

《柳班》章中，拉吉舍夫苦于马车的颠簸下车休息，徒步而行时看到了路旁忙于耕种的农民，便上前搭话。移动方式的改变促成了拉吉舍夫与农民的互动，是实现这一行为的关键可能性，如果作家继续躺在马车上任由思绪飘上云端，那么就无法与路边的农民产生联系；而另一方面，步行就可以走近农民。它消解了二者沟通的阻碍，也影响到后续对话的内容，使农奴的诉苦更真实、更令人动容。如果作家从马车的车窗向外同农民攀谈，苦耕的农民望着马车上的陌生老爷，恐怕是兴不起一丝交谈的欲望的。作为一位贵族革命家，拉吉舍夫与人民的联系是单薄的，但他做出了走向农民的尝试，鉴于农奴不具备人权，所以拉吉舍夫将农民作为章节的主人公进行书写无疑是超前的（吴笛 2019: 60）。

理想的行走是“身体、心智和世界相关联的一种状态，仿佛三者之间在对话，并共谱和弦”，行走亦是自我、他者和自然之间的互动（朱璇，江泓源 2019: 28）。听完农民的倾诉，拉吉舍夫同情地在内心谴责地主，但转头却看到驾车的仆人在马车上困倦得左摇右摆，作家意识到他亦在压迫他人，就不禁面红耳赤，万分羞愧。散步中遇到的人是景观化了的“他者”和“我”，散步是重新认识他人的过程，其实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朱璇，江泓源 2019: 37）。拉吉舍夫在旅途中反省自身，可见《旅行记》不仅仅是对沙皇的反抗之旅，也是作家的净化之旅。

《勃隆尼齐》章中，拉吉舍夫徒步去神庙参拜，祈求安宁。徒步中脚掌接触大地，同大自然对话，产生了休闲和愉悦感，拉吉舍夫也在步行中消解乏闷、进行思考。这时的徒步旅行是反思性仪式，与神沟通的过程中，作家建构了对自我的认同和对国家的依恋。作家失望地站在山顶，茫然望着祖国的远方，怀着对更好的社会秩序的渴望，一种苦苦求索的激情也许就藏在他的潜意识里（吴泽霖 2007: 76）。拉吉舍夫是独行的探索者，旅途中孤寂感常伴他左右；作家发出不同声音，虽无人支持，但他还是坚定地沿着既定的路走下去，这份落寞与决绝不禁让人动容。

步行是人人都有能力，却不总是人人都有权利。克雷斯维尔认为移动性也承载着意义，通常包含意识形态色彩；阿迪（Peter Adey）在《移动性》（Mobility）中指出要同时关

注移动和“不动”(immobility)。贵族可以自由移动,农奴却被束缚在土地上,由此拉吉舍夫对自由进行了阐释。作家认为自由是一切伟大事业的源泉,并首先提出了公民自由的概念,他认为自由是与生俱来的权利:原始人可以随意移动,但随着公权力和特权阶层的产生,普通人逐渐失去自由。他认为法律不应是限制自由的桎梏,而应是自由的保障(杨秀杰 2007: 58)。今天我们理所应当认为人生来即有移动的权利,移动性是一种基本的人权。贵族和农奴移动能力的不同引发了拉吉舍夫关于自由和平等的思考,但从沙皇的角度看,移动性却成为一种不安定因素,对统治秩序形成了挑战,成为颠覆王朝的隐患。所以《旅行记》出版后,叶卡捷琳娜二世就下令将拉吉舍夫逮捕并处以死刑,后改为在西伯利亚流放十年。

5 结束语

《旅行记》是拉吉舍夫思想的汇集,多种思想的糅合和艺术形式的不连贯、不统一使得这部书更像是拉吉舍夫的一次文学实验,但这并不能否定拉吉舍夫开创性的思想给俄国社会带来的进步意义:他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和贵族继承制,传播自由平等的思想;他认识到了农民和劳动的美,并试图唤醒农民进行自我拯救;他重视法律,劝诫沙皇敬畏人民;他提出了改革和革命的两套方案;他关于科学、教育、生命、道德的见解也具有一定意义。这些思想不是孤立和静止的,在移动性理论视域下,它们联系成为一个流动的整体。虽然个体生命是有限的,流放也可能会动摇拉吉舍夫的决心,但却不能磨灭他的思想;作为一位探索者和领路人,他敢于实践、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敬佩。在《旅行记》之前,俄国很少有其他作品能对社会现实产生如此直接的作用,作品对后世的影响是显著的:越来越多的作家意识到自身肩负的社会责任,开始以作品介入社会生活。《旅行记》影响了一代代进步青年和革命者,在经历了大大小小的改革和革命后,1861年俄国的专制农奴制终于被推翻了。

附注

1 安栖主义(sedentarism)强调地方(place)、根基(root)、稳定性(fixity)和秩序(order)。在《超越社会的社会学》(Sociology beyond Societies)中,厄里曾指出安栖主义与海德格尔哲学有一定渊源;在《新的移动性范式》中,厄里又结合克雷斯维尔等学者的观点,批评安栖主义的本质是将本真而有界的地方、地区或国家作为人类身份认同与经验的重要基础和社会研究的基本单位。

参考文献

- [1]Коптева Э. И. “Видения” и “Разговоры в царстве мёртвых” в “Путешествии из Петербурга” в Москву А. Н. Радищева[J]. Мир науки, культуры, образования, 2010(6-2).
- [2]Садикова Д. Р. Рецепция идеи просвещенного абсолютизма французских просветителей в трудах А. Н. Радищева (по материалам советск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J]. Вестник Том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университета, 2015(9).
- [3]McConnell A. A. Russian Philosopher Alexander Radishchev[M]. The Hague: Martinus Nijhoff Publishers, 1964.
- [4][俄]拉吉舍夫. 从彼得堡到莫斯科旅行记[M]. 汤毓强译. 北京: 外国文学出版社, 1982.
- [5][俄]普希金. 普希金全集(第6卷)[M]. 邓学禹, 孙蕾译.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2.
- [6]曹靖华. 俄苏文学史(第1卷)[M]. 郑州: 河南教育出版社, 1992.
- [7]吴 笛. 论拉吉舍夫作品中的法律书写[J]. 俄罗斯文艺, 2019(4).
- [8]吴泽霖. 朝圣——当今俄国东正教文化重要现象考察[J]. 俄罗斯文艺, 2007(3).
- [9]杨秀杰. 透析拉吉舍夫语言中的自由观念[J]. 俄罗斯文艺, 2007(2).
- [10]张 杰. 西方文论关键词 移动性[J]. 外国文学, 2021(3).
- [11]朱 璇, 江泓源. 移动性范式下的徒步体验研究——以徽杭古道为例[J]. 旅游科学, 2019(2).

On Radishchev's Thought

— A Study of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bility Theory

Mu Jia-wei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Harbin 150080, China)

Abstract: Radishchev was not only a literary scholar and an aristocratic revolutionary, but also a thinker who, with his passion for human dignity and social justice, spent his life in the pursuit of truth and awakened the people with his brushstrokes. His works reflect his concern for people, society and the world. His main work of his life, the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is known to critics as a work against authoritarian serfdom, which expresses the writer's revolutionary ideas. But in addition, the *Journey* also illustrates his views on a range of issues, including law, human rights, marriage, family, education, and life. The *Journey* is constructed through movement so that applying mobility theory to analyze this work can help us analyze Radishchev's profound and complex thoughts and explore the richness of the *Journey*. It is also an attempt to apply mobility theory to literary studies, which in turn will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mobility theory.

Key words: Radishchev; *Journey from St. Petersburg to Moscow*; mobility

作者简介: 穆嘉伟（1999—），山东滨州人，黑龙江大学俄语学院研究生，研究方向：俄罗斯文学。

收稿日期: 2023-03-17

[责任编辑: 刘 锐]